

第一章

“黑色的七月”与“美丽的折磨”

中国是一个教育大国，也是一个教育古国。两千多年前大教育家孔子的出现，让神州大地阳光普照。从汉代开始，考试制度的出现，让众多望子成龙的家长们找到了光宗耀祖的最佳渠道，为了名题金榜，一代又一代的家长们用“凿壁偷光”“头悬梁 锥刺股”的训诫教育自己的子女。

中国考试制度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汉代 察举制（由地方官吏考察推举）

魏晋 九品官人法（由中正官按照九种等级考察人才）

隋代 设进士科

唐代 完备的科举制

1905 年：废除科举制

1938 年：民国国立高校联合招生

1949 年：“维持原校”仍然单独招生

1952 年：全国统一招生考试

1964 年：分文理两科

1966 至 1976 年：停止全国统考招生

1977 年：恢复高考制度

……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中国考试制度中的两件大事给大家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一是“文革”期间长达十年全国统考招生制度的停止，残酷地剥夺了千千万万青年上大学深造的权利，同时也泯灭了众多家长望子成龙的希望；二是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如经历漫长严冬之后的缕缕春光让无数的人欣喜若狂奔走相告，那情景那场面让人激动不已且难以忘怀。

黑色的七月

然而数年之后，高考带给人们的已不再是激动，而是几乎难以承受的压力。报告文学作家陈冠柏在一篇题为《黑色的七月》的报告文学中，对此作了详细的描述——

在七月的日历上，由于高考招生的幽灵游荡而变得云谲波诡。

千万人参与竞争的高考像狂暴的季风，周期性地席卷中国大陆。

对于直接或间接地旋入这场暴风雨的人们说来，这是个激烈厮拼的七月，昏天黑地的七月。

且把我的长镜头首先对准这个画面——

面对着案头的文具盒，他把盖儿打开，复又合上。犹豫。踟蹰。终于取出了那把幽光闪烁的刮胡子刀片。

当刀片触及食指时，他发觉手指像条颤动的弦……

洁白的纸上留下了殷红殷红的几个字：7.7—9。

这是全国高校招生统考日期。也是全国数百万青年人命运搏击的日期。

就如这血写的颜色，七月，本该是红色的。

我从那些蒸腾着暑浪汗雨的教室走过。从那些贴满千奇百怪的难题、绝题的甬道走过。从那些于燥热难熬的午后在柳阴下苦苦诵读的人们身边走过。从那些蚊子围攻的斗室走过。人们都说：“考大学跟打仗一样紧张。”

我得以匆匆拜识了这支浩浩结集的“临战队伍”。从冲锋的士兵到指挥官、教官和庞大的后勤给养大军。那是一支被热望和不安撩得略呈纷乱队伍。在他们的时刻表里，总攻发起时间仿佛不是七月七日上午九时而是在这一刻——

风油精熏透的模拟考场

韩云云的一肚子牢骚是从小小的风油精引起的。

——说真的，我真不想去参加那场模拟考试。再过一个多星期就高考了。本来就紧张得要死，还来火上浇油。时间早像快挤干了的海绵，除了6小时睡觉，剩下十七八个小时都排得满满的，可还要花三天时间去参加那场演习。不去，老师说了，鉴定上得写一笔。谁敢冒这险？除了根本没指望的，破罐破摔，剩下的都去了，再说大热天，老师不休息，也为我们好。

头两天黑板上就写着：“别忘了带风油精！！”两个大惊叹号一下就把气氛给弄紧张了。虽说是模拟考，假的，可老师硬要我们“跟真的一样”。

一切都是按高考的时间、程序、座次、行走路线来进行的。弄得挺神秘。进考场后先审题，铃响才可以动笔。嗨，那题真够吓人的。老师把各种各样的题都拿来展览了——填空的、判错的、选择的、对比的、叙述的、看图回答的，反正高山大河峡谷平川都让我们见识了。那些题目真够多，光政治课考卷就整整18页，每一小格都有分数。我老觉得那像是手表上的秒针，脑子里稍一格登，就走过去赶不上了。

那三天天气也撞上了鬼，没见那么热的。教室里没电扇，一会儿，手臂上的汗就把考卷边儿给卷了。又热又急，脑子里昏昏沉沉的。这才想起老师的提醒：抹风油精。我一抹，这樟脑味扩散开来起了连锁反应，教室里四十多瓶风油精都打开了，那味儿跟药厂一样，熏得慌。

考到一半，后排不知谁哼了一声，大家一回头，是王大林伏倒在课桌上了。他平时身体很结实的，还是校足球队的中锋，可现在脸煞白煞白，嘴唇也紫了。这下乱了套，老师提着个喷的药罐子，朝他鼻子这儿吱吱地

喷几下，这才苏醒过来。可神也没了，让老师架着出去了。桌上那瓶风油精已用去了好些。没听清是谁说了句俏皮话，“中锋在黎明前死去了！”招来一阵大笑。一笑，吸了几大口风油精分子，人倒来精神了。

第八次拼搏

董强在高考报名表上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填上了自己的名字。25岁的年龄不允许他继续报考了。

他的眼光从报名点攒动着的人头上掠过，内心涌起难言的羞涩与自愧。同身边这群活蹦乱跳的小弟弟小妹妹相比，他已经洗尽了毛孩子的童稚、天真，倒像个真正的男子汉。毛茸茸的唇须，雕琢得严峻的肌肉棱角，便是他成熟的表征。

——可我算什么男子汉！18岁开始头一回进考场，跌跌绊绊，接连考了7次。我一见报名表就犯怵，年龄在爬梯子呢！

和我一起考的同学一批批毕业了，有的回来还当了我的辅导老师。村里人挖苦我：强强，抗战才八年，这考大学真比打小日本还难？

我上哪诉苦去？我是给逼的。家乡盛行“耕读传家”的古风，再苦再穷也要读书。我爸说，民国二十二年村里就有民约，子孙上学，初中毕业每年奖大洋8块，上高中每学期奖大洋8块，大学毕业18元，东洋留学32元，到欧美就给64块大洋。读书人都分得到“尚贤田”，就是人死了，清明坟头也还有人给供馒头。这风气就一代代地传下来，从没断过。

我父母是这块土地上的人，也照这个规矩要我在读书路上走到底。妈说让考几回就考几回，考到政策不让考为止，反正不等你赚钱养家。我说考不出的“老童生”给人戳脊背，她说怕啥，落难公子中状元，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鲁班造桥造了几回？诸葛亮还要失街亭哩。每回落榜，没半句责备，总是好菜好酒待我：别急上火，还有下回呢！我一听这细细软软的宽慰话，心里像欠了大债，发誓要让父母宽心。要是他们吹胡子瞪眼，训我骂我，说不定我早一狠心甩手走了。

董强说得很凄婉，很坦诚。中国的文化心理就这样根深蒂固，即令在

一个没啥文化的农村妇女身上也如许冥顽，“不到黄河心不死”“宁肯‘到了黄河出眼泪’”只要还有机会，不论希望何等渺茫，也绝不放弃。

在考场白线外

一道 10 厘米宽的油漆白线把考场和周围隔离了起来，借以防止激狂型的家长越过禁区干扰考场。它极像马路上的快慢车分道线，只是线两侧的人都坐在焦躁和惊忧上。

考场的森严古板和空气的窒息从来如此。当今亦然。值得写一笔的倒是白线外异乎寻常的陪考队列。

那是何等壮观而含情脉脉的队列呀！

从白线外可以清晰望见 15 米外的考场，三道启开的门窗托出伏案者的头。白线外的人频繁地来回换位，寻求可以窥见自己宝贝的最佳角度。蹙眉、窃喜、托腮、撅嘴、焦急地掏手帕、翻动试卷的速度和情绪——里面传来的每个情绪动态，都会立即在他们的脸上引起宽慰或惊愁的表情。这可是在烈日下唷！气象预报 37℃，阳光直射下其实有 50℃，但很少有人进入学校准备的休息室。他们在白线外的状态，令人想起站在百米起跑线上等待冲刺的赛手。

许多人手中拎着簇新的冰瓶，里面装着人参汤、银耳、冰激凌和可口可乐。他们不时用舌头去舔润缺少水分的双唇，但从没想过打开冰瓶解渴。

在这个队列里，可以听到这个城市最新的商品供求信息——

“这两天‘青春宝’都断档了，考大学的都拿这个补。”

“‘青春宝’不是抗衰老药吗？”

“你呀，有老抗老，无老防老，小青年吃这个益气补血提神壮心，灵着哩！”

“我听说巧克力也难买。”

“可不，都去‘接力’了。我今天早上给女儿兜里塞了 6 颗朱古力，带锡纸的，当补药一样吃。”

从隋朝开创“开科取士”之先河，有了考场这个地方起，像这样富庶的懂营养学的陪考队伍还是首次出现。现代物质文明带来的喜与愁哟！

白线里的心态

我曾经向 10 名考生作过这样的调查：“在你踏进考场的刹那，心里想些什么？”

回答的结果是：“满有把握”二人；“这个关难过”三人；“随它去，有啥算啥”一人；“什么都没想，光是心里砰砰乱跳”四人。

它显示，除两极外，70%的考生心理负担过重。

我在高校招生办公室读过一些考生来信，可提供第一手文字依据。

——面对高考，我既高兴又焦虑。高兴的是自己盼望已久的“大学梦”可能就要实现，焦虑的是万一落榜怎么办？父母只我一根独苗，一心要把我培养成儒生，虽然我的家庭并不富裕。我只有考上大学才对得起父母，才能为乡人所称道，才有惟一光明灿烂的前途。如果落榜回乡，那将为众人取笑，无地自容。因此我一看到“高考”——这个人生转折点的字眼就感到畏惧，我甚至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万一落榜后的打算——走绝路。可我想这并不是当代青年对失败应有的态度，如果这样做也不免为人所取笑，更对不起父母。总之，我现在心里极矛盾，以至蹉跎时光……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考上。如果不能，迷茫、痛苦、失望，种种压力都会袭来。想再补习重考，教育局又下令禁止办复习班，这无疑又给我们这些即将落榜者当头一棒。我们在日日等待着，得过且过，在这人生最后一丝希望行将破灭之际，我们的生命之柱将依在哪儿呢？

——我们不是班上的尖子生。我们为自己的命运而悲叹。命运在捉弄我们。小学毕业盼进重点中学，谁料重点中学改成高中，不招初中。我们只好涌进一个很蹩脚的初中。好不容易进了重点高中，原来的 8 个重点班一下降到 5 个，又把我们挤了。我们同样一步一个脚印，我们同样向

往大学，可“重点”老是和我们捉迷藏。先生们会说考不上正规大学不是还有电大、业大吗？何必都往正规大学挤呢？是的，世上的路有无数，可是这些先生比谁都清楚，这个社会存在着世俗偏见。有谁会对我们命运的不幸洒几滴同情之泪呢？

.....

背进考场的落榜者

一个面容惨白的女学生由老师背着进了考场。揣在老师兜里的病历卡上写着：“冯君 急性菌痢 高烧 38.5℃ 已输液 用庆大霉素……”

冯君浑身像团棉花。

真是倒透霉的三天 天天让老师背着去 她连自己都记不清是每次怎样从考场出来的。

作为班里的团支部书记 她品学兼优 本来完全可以报考名牌大学的热门系科。她偏偏选中了时下正贬值的思想教育专业。某大学的招生负责人闻之如获至宝，希望她能通过这个专业的学习，成为一名卓有成效的思想教育工作者。

天有不测风云 她病了 竭尽全力 离录取线仍差 5 分。

对未来思想工作抱有热情的招生负责人为了让冯君越过这 5 分的拦阻到处奔走呼号：“5 分 才 5 分哪 这么好的人才！”

“分数线是铁定的硬杠子。分数线下六亲不认。分数线上各显神通。”——这便是当今中国一个既清明又含混 既合理又不合理 既需肯定又必须否定的界线。

一张考卷定终身。冯君泪流不止。同情她的不乏其人，想帮助她的回天乏力。

在听到冯君的遭遇后，一个老教育家郁郁乎不能成眠。他在写给教育部门的一封信中说：“冯君的泪又一次洗了我的眼睛，以一次考试优劣成败来决定录取与否，势必把学生驱赶到死记硬背、临场拼搏、消极竞争的死胡同里。也势必会扼杀像冯君那样有能力、有创见、有抱负的人才。”

叫了好久的招生制度的改革难道还不该从领导者的口头上搬到现实中来吗 给学生、家长、教师 统统来个解放吧！”

无声的守夜

两小时过去了。夜露已悄没声地潜入每一片叶脉、每一朵花瓣 可是谁也没言语 闷坐着 围着自己的校长——这个败军之帅。

他一下子苍老了许多，花白的头发和髭须杂乱地簇于头顶和肌肉松弛的脸部。原准备高考揭榜后再理，“不打破零蛋不理发”，很有点像日本守擂棋圣藤泽秀行“败擂削发”的决心，但现状使他又将一年进不了理发店——八中又一次被剃了光头，120 多名考生全部落第。他老早听说过一个来自四川的笑话：有所中学没一个学生考上大学，理发师谢绝给教师理发：“你们已经剃了光头，还理什么发？”这个味道今天让他来品尝了。

在座的都是学校领导班子成员，晚饭后齐聚校长家。这一天像过了漫长的一年。学生骂，家长也骂。老师出去买菜也被挖苦。卖菜的说：“你们还有脸来买菜？啥时把学生送进大学再卖给你！”吓得老师都不敢戴八中的校徽。懊丧的空气笼罩整个校园，一个老师指着操场上晃荡着的吊环发火：“像他妈的绞刑架！”

他们想安慰校长，也更想听听校长的想法。可校长老不开口，闷着。

怎么说呢 校长心似明镜 这一年哪个教师没下苦功 可是他们手下的学生并不是冲得上的精兵强将呀！就这个分数从高考管到高中、初中乃至小学，分数为纲 全面紧张！初中毕业生考高中 也按分数切成段 530 分以上到重点 470 分以上到普通中学，剩下进职业高中。到他这个学校的比人家重点相差约一个档次，谁能在三年内创奇迹？师资、设备都比人家差……

作为执教多年的校长 他多次力图勒转这匹单纯追求分数的野马 可是谈何容易！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就像美苏裁军谈判，越谈裁军就越扩军。学校和学校比 班级和班级比 教师和教师比 谁心里都清楚 没有几

个学生考上大学，“全面培养人才”的高调唱得再动听也没用。这标准那标准弄到最后就是谁升学率高这一标准。社会、家长、学生都拿这个尺子来量。学校里评三好生、成绩优等生，奖状拿回去眉开眼笑；社会活动积极分子、劳动积极分子的奖状拿回去家长反而骂：“这个顶屁用！”吓得好多学生领了奖状在半路上撕了。这么一个强惯性，把人都迫急了，扭回来谈何容易……

再度集结的高复大军

光明补习学校的招生通知再次在这里掀起一场报名热。680 多人争着挤进 400 个名额里。各级头头的条子，加上本乡名流的介绍以及各种关系疏通过来的招呼，使校长周大震焦头烂额。

不能再挤了，因而也不能再收了。我由周校长领着到名为学校的半边小院里转了转，为潜在的高考大军而惊骇。

校舍是租用村里一个未曾使用过的养猪场，四壁是未经泥抹粉刷的粗糙砖墙。不过 40 来平方米的大屋里排着 50 张桌子，连讲台两侧和窗户外都摆着桌子。桌子是租的，凳子学生自带，桌上间距容不得一个人转身，窗户没玻璃，光线不佳，桌上摞着各种版本的复习资料。室内死寂，惟有翻书时的轻微沙沙声。这是一个没有欢笑喧闹的学校，像是一所肃穆的教堂，虔诚的教徒在礼拜分数这个上帝。

四乡来的学生在周围农民家租房，三四个人合住。没有床铺，夏天一张草席，一盘蚊香，乡下的蚊子其实是不大怕蚊香的；冷天也没有床铺，草席下垫上层稻草，没有食堂，在附近的茶水灶蒸饭，自己带菜，大多是干涩无油的霉干菜。小铺应运而生，提供 5 分一碗的廉价青菜。于是这一带渐渐成为“考生街”。

我问一个叫金永的考生：“这样读，苦吗？”

“苦也要读。上大学，总要吃苦。”

另一个叫胡伟的考生在回答为何要上高复班时说：“一生只给一次机会，太不公平了。我考了 500 多分，差不了多少，这次实力没有发挥，有点

紧张。”

“要再失败呢？”

“反正谁都会有失败的时候。我不相信失败会永远属于我。”

筹办这个学校的周大震是农工民主党当地支部负责人。他说：“我承认高复班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不可能万岁。但是既然考生要求，家长盼望，这高复班就不是一张纸头帮得了的。上面说高复班有十大弊病 随他说去 反正不是犯罪！”

在这个高复班所在的省份 当年应届考生 4.5 万多人 历届考生 1 万多人 招生 2 万 被淘汰的 3 万以上 次年 应届 8.5 万 历届 2 万多 招生 2 万 被淘汰的 8 万多 第三年 应届 9 万人 历届 3 万 招生数不会有什么增多 又会有 10 多万考生被挤出角逐区，然后相继加入下一年的高考队伍。如此往复 年年递增 面对高考升学“独木桥”的竞争战更趋激烈 世界将因之不得安宁。

美丽的折磨

对于众多家长来说，与孩子一同付出了许许多多的艰辛之后终于盼来了孩子参加高考的日子，眼看着孩子长大，十几年的辛劳与期待就要结出丰满或干瘪的果实，其心情大都是美丽而甜蜜的。

但与此同时 他们的心情同样紧张——不 甚至比他们的孩子还要紧张。就是在 1997 年夏天——恢复高考 20 周年之际 中国的一些城市出现了一些奇特的场景——

哈尔滨 从 7 月 7 日起 一张写有“高考 车禁行”字样的标语 贴在临时横卧于该市道里区上游街中央的课桌上。数百名高考考生家长守卫在第十八中学所在的上游街两端 借助一条红色“拦路绳”将欲经过考点的汽车阻拦住。这样的“封街”行动持续数天，以致按照正常规则行驶的机动车，包括多路公共汽车及一辆农行运钞车都被迫违章绕行。前去劝阻的哈市教委、道里区政府及交警大队有关人员均遭到围攻。家长担心汽

车噪音会影响考试的孩子 声称“是老百姓的自发行动 你能咋的？”

上海一名李姓女生高考前随父母回沪 因奶奶家不宽敞 她和母亲住进附近一家三星级的宾馆，320元一天，准备住到考试结束。有报道说，杭州城内酒店、宾馆纷纷推出优惠考生住房服务项目，生意十分兴隆。一些酒店人员说 明年要早做准备。

北京应广大家长要求 市建委高考前发出通知 在6月20日—7月10日期间要求各施工单位减少噪音污染 除抢修工程和重点工程 其他夜间施工工程一律停止。众家长高考前那颗悬着的心总算稍微往下降了降。

.....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曾对入学新生做过调查，有60%的人认为面对高考，父母比自己更紧张。主持这一调查的北京建工学院心理咨询中心主任郑宁老师说 让学生填完问卷后 他连续翻了很多张 当时就有些震动。因为面对高考的毕竟是考生自己，而许多学生在回答“家庭中谁更焦虑”的问题时填的是“父母”而填“母亲”的更多。

为什么父母比孩子更焦虑呢？郑宁老师说，可能有这样几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父母看问题比孩子更远一点、更现实一点，知道孩子考不上大学的后果是什么，因此心理压力比孩子大；再一点是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有些甚至是把没有达到的愿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孩子能成功，特别是独生子女，好像就是惟一的希望；另外有些家长从小就对孩子大包大揽，孩子还没出生就有许多计划，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都要找最好的，而大学虽然没法替孩子找了，但孩子考得上考不上，家长也觉得是自己的责任。有的时候，做父母的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比孩子还焦虑。一部分父母担心给孩子增加心理压力，有什么话不敢和孩子说，甚至有学生告诉我，高考之前父母都不敢对他大声说话。但家长的这种状态无形中还是会给孩子压力。那么多学生认为父母比自己更焦虑，是因为他们从家庭的气氛中感觉到了。

郑宁老师说，要让孩子减轻焦虑感，家长首先要解决好自己问题。他提出几点建议 有些问题 家长可以找有关的老师咨询 做到心中有数；

更重要的是，家长要明白自己不能包孩子一辈子，同时要信任孩子。有些家长希望孩子能考出最好水平。最好水平是超常发挥，比如经常考 90 分的孩子某次考了 100 分，就可能是超常发挥。如果把超常当成正常来要求孩子，孩子达不到，家长就可能越来越失望，家长的态度就容易给孩子造成压力。

郑宁老师的分析虽不无道理，但对于众多家长来说，他们心头的压力并非烟雾般可以挥之即去。感受到考试压力的，不仅仅是家长和学生，还有学校的老师。这种压力由高考而来，然后由高向低传染扩散，在中考形成同样的高强度。因为中考的好坏，很大程度决定着考生能否升上重点中学，而能否上重点中学又决定着考生能否在高考这一决定人生命运的关键时刻稳操胜券。

延伸阅读：

老师，请不要再倒计时了

3 月 5 日是学雷锋的日子，3 月 5 日是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 100 周年的日子。可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这一天您没有跟我们讲这些，这一天您在我们黑板的左上角挂上了醒目的“距中考还有 100 天”的倒计时牌。

从此，我们的老师，您就每天几次对我们说：“距中考还有 ××天……”

早晨，当我们正兴致勃勃地读书时，您突然敲着倒计时牌对我们说：“距中考还有 ××天。”顿时，我们读书的兴趣全没了。一直到下课，那原有的浓厚的读书气氛全消失了。您说得越早，我们浪费的时间就越多。一日之计在于晨。唉，多么可惜啊！

中午，当我们伏在桌子上正想休息一会儿时，老师，您又走进教室，敲着倒计时牌对我们说：“距中考还有 ××天。”一下子，我们刚要松弛一点儿的心弦又绷紧了。睡意虽然暂时被赶跑了，可是带来的

却是整个下午难以忍耐的瞌睡，我们欲睡不敢，我们欲听不能。即便是强打着精神听讲，可是听着听着，我们的耳边就会响起您敲倒计时牌对我们说话的声音；即便是我们硬撑着眼皮看黑板，可是看着看着，我们的视线就被倒计时牌吸引过去……

晚上放学 老师 您可知道 此时此刻 我们是多么希望您正在家里吃晚饭，或正在家里看电视。可是，当我们背着沉重的书包，拖着沉重的脚步准备回家时，老师，您又不辞辛苦地赶到教室更换倒计时牌的日期 对我们说……

好了，您这一说打不紧，我们的心这一整夜却再也不敢安宁了。

吃晚饭时，吃着吃着，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个倒计时牌，就会想起您说的那句话。于是，我默默地放下碗筷，再也无法咽下父母为我准备的美餐。父母看到我这样，也只能噙着泪，摇头叹息着为我收拾碗筷。看到父母这样，我的心情就更加难过。父母不知道我的苦衷 为了您 老师 我也没向父母诉说这苦衷。

做作业时，想着想着，您的那句话又在我的耳边响起，那个倒计时牌又在我的眼前浮现。于是，我的思路就再也无法清晰起来，不是把题目看错，就是把答案写错……

没有办法，只好睡觉。临睡前，我曾告诫自己，不去想您挂的那个牌子，不去想您说的那句话。可是一躺到床上，您说的那句话，您挂的那个牌子又魔鬼般地出现了。尽管我是那么地想睡，尽管我拼命地数着 1、2、3、4、5……可是我就是无法入睡。烦躁极了，我就疯狂地挥舞拳头使劲地捶自己的胸膛，使劲地敲自己的脑袋，然后再歇斯底里地大吼一声“啊——”只有这样 我的心里似乎才觉得好受一点。然而这样又容易引来父母的惊慌失措，我的内心又感到十分不安。

后来，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可我仍模模糊糊地看到老师您在教室里敲着那块牌子对我们说……噩梦中，我的耳边有无数种您的声音在对我怒吼；噩梦中，我的眼前有无数个倒计时牌在飞舞……好几次，好几次，我都是从这噩梦中惊醒。尽管也算是睡了几个小时，可是醒来后，我的头脑更加迷迷糊糊、昏昏沉沉。醒来后，发现父亲和

衣伏在我的床边，母亲已在厨房里为我准备早饭。看到可怜可敬的父母 我心如刀绞 泪如泉涌 ——敬爱的爸爸妈妈，您的不孝儿子让您操心了，儿子对不起你们！

吃早饭时，只隐隐约约听父母说什么休学的事。休学，我是多么想休学啊，可是休学的机会已经错过了。我又不想休学，休得了今年，还休得了明年吗？谁还能说准明年的这时，老师您不再挂那个牌子呢？您不再喋喋不休地说那句话呢？

那个倒计时牌 是一个魔牌 是一个鬼牌！

老师，您可知道，多少次，多少次，我们曾想把那个倒计时牌砸掉，或偷偷拿掉藏起来。可是我们忍住了，没那么做。不过，我们还是有了一点表示的。老师，您还记得，有一次倒计时牌倒转着身子朝里吗？您还记得，有几次倒计时牌子上的数字被擦掉一位吗？您还记得，有一次倒计时牌下面的黑板上写着这样的诗句：长夜难明考试天 百日计牌舞蹁跹……

老师，您还知道吗，我们班上曾有人打算逃学，曾有人打算出走，曾有人打算自杀。多么可怕！老师，您不要以为我这是在骗您，您不要以为我这是在吓唬您，这些打算确实是有过的啊，有的甚至已付诸行动，只不过被家长及时发现并妥善处理没让您知道罢了。

老师，我们也到其他班级看过，我们也向其他学校的同学了解过。他们的班上也采用倒计时的方式，只不过形式不完全一致罢了。我们敬爱的老师，在大声疾呼素质教育的今天，你们为什么还这么做？你们为什么都这么做？你们到底是怎么啦？你们到底想把我们的学生怎么啦？

老师 求求您 请不要再倒计时了 为了我们。

求求您 老师 请不要再倒计时了 也为了你们。

请救救我们吧，请救救我们的老师吧。因为还有一些日子，因为还有明年……

第二章

指挥棒的魔力与罪恶

在当今中国大地，应试教育已被多次诟病，而躲在校园深处的名次排队的危害却依然被人们所忽略。在素质教育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我们该如何正视这些问题呢？

名次排队：盘旋在中小學生 心灵上空的暴风雪

理达是北京某重点中学的一名教师，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教育“圈内人”对学校教育中的许多“幕后动作”可谓了然于胸。他寄给《中国青年》杂志一篇题为《名次排队的忧思》的文章，掀开了中国教育界围绕应试教育指挥棒进行排队的“冰山一角”——

“排队”面面观

一次较大型的考试后，总要有一些学生追着教师问排不排队，若哪一位开明些的教师吐出“不排”的金口玉言时，往往会激发起学生的热烈欢

呼。在学生中流传的校园隐语中称家长会为“今夜有暴风雪”家长指责孩子的“暴风雪”的源头大约也由于名次排队。可能一个班级中只有排名第一的学生能躲过这场“暴风雪”（当然也免不了“保持下去”之类的话语），甚至名列前茅的一些学生，由于家长期望值甚高，也往往同样难逃一劫。

名次排队大多是要张榜公布的，也有的教师会输入电脑，在每次期中、期末考试后打出来，于是每个学生、每位家长手中便有了一张起伏不定的荣辱榜。当然，有时这些“榜文”也会暂时不公布。有一位教师曾对我说起他的一个学生。期末考试，这个学生名列全班第 51 名（倒数第 8 名）她母亲会打我会罚我下跪的！”这个学生向老师哭诉。在得到“下次一定努力，一定进步”的保证之后，教师答应了暂时不向这位学生家长公布“榜文”。没想到下次考试她物理考试又失败了，于是偷偷摸入办公室抽换了试卷。“这孩子不诚实品质坏了！但我没有对她母亲说怕她出事，我可不想负这个责！”这位教师对我说。亲戚中有一个高二学生，我不经意地问起他的名次，他凄惶地说：“我是圈外人士。”“嗯？”我不懂。“每次考试后，老师都要画定一个名次圈，称为‘希望圈’。画到圈外的，就被老师、同学视为‘圈外人士’……”他解释。眉目间笼着铅一般的阴云。学生中私改成绩单、名次表的绝非个别。

“名次排队”给学生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教育领导部门不会视而不见。某区一所市重点中学期中考试后，一个初三学生惮于排名的压力，留下一纸遗书，自杀了。新闻界没有炒作这条新闻，但接下来一些领导者的表现却耐人寻味。全区紧急通知“取消名次排队”，附近一所区重点中学正在准备开家长会，排名大榜已张贴在会场，得到通知，匆忙撤下。校长向班主任们面授机宜：名次一定要排，一定要让家长知道，但不许写出来，不许印发下去，不许留下把柄。至于怎么传达给家长，你们自己看着办。这就奇怪了：如果名次排队是必须实行的好事，就光明正大地坚持得了；如果名次排队是弊大于利的坏事，就理所当然地应该废止。这种必欲行之又谨防物议的心态与健康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是格格不入的吧？

名次排队带给学生的负面影响绝不止是心理上的沉重压力。某些学

校是以量化来计算学生的综合表现的。在量化名次表前列的，可以享有各种优待 座位靠前 免做值日等等 在后的 座位要靠后 值日要双份。量化的内容也包括考试成绩，例如第一名可加 100 万分 那么最后一名就要扣掉 100 万分。不过 分数是可以用钱、物弥补的 向班里捐款捐物就可以因为“热爱班集体”而补回几十万、上百万分的。在这种管理下：名次、分数、荣辱、实利、金钱完全被搅为一团 污染着学生纯洁的心灵。

在名次排队的环境里，是无法推行素质教育的——如果哪位校长 哪位教师还有心“素质”一下的话。学生在积累着分清‘应试’与‘素质’界限的经验，既然名次上只能反映有硬指标的考试成绩而很难表现软性的综合素质 那么有谁还去旁顾应试‘圈外’事。课堂外 与应试没有直接关联的讲座、社团活动，很难吸引学生的目光和脚步。社队活动萧条，科技活动冷落，文学书籍蒙尘。学生知识面狭窄，动手能力很差，综合素质令人担忧，就是考试成绩本身也开始受到自身的报应。由于语文学科（尤其是作文），应试努力与考试成绩很难产生短期内对应的效应，因此受到严重冲击。学生在学习中的偏科现象本应是由学校运用教学手段予以制约的，现在反而受到校方制导。在某些推行中考科目改革的试点地区，化学课被砍掉了，政治课被削减了。学校要的是中考成绩，要的是排队名次的荣光，这是最实际，最实惠的。名次排队不但摧残着学生，也吞噬着教师的良心。

名次排队将每位教师的工作压缩成一张表格，表格里没有他们的诸多软性工作，无视复杂的客观因素，只展示应试的最终结果，而这结果又关系到每位教师的荣辱升迁。那么，哪些是提高排名的直接因素，哪些做法能立竿见影 越来越多的老师都在心中拨算出一笔精明的“小九九” 谁还去顾及学生的全面素质呢？于是学校教育被压缩到应试的狭小空间，课堂教学变成应试的题海大战。

名次排队的荣辱是相互比较而存在的。那么 各区之争 各校之争的内里，各科之争，各班之争也就愈演愈烈。我曾见到一位语文教师，急匆匆拿过高考成绩各校排名表，当看到自己以高于第 12 名 0.1 分的差距居于区第 11 名时，她额手称庆，长舒了一口气。因为这是那所学校 5 科中